

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格特徵^{*}

李 驚 哲^{**}

摘 要

郭實獵是非常重要的來華新教傳教士，他的個性向來以瘋狂、奇特與不可理喻著稱。這與郭實獵青少年時期波折的經歷有密切關係。他不但深受虔信宗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以臨床心理學的視角探查，他的行為還表現出「自戀型人格障礙」的大多數典型特徵。此類將心理學臨床診斷標準引入歷史研究的新方法，為我們研究歷史人物提供了具有一定價值的新視角。而郭實獵的特殊人格特徵或許正是我們理解他在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一系列影響深遠卻有充滿矛盾的活動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郭實獵、自戀型人格障礙、浪漫主義、虔信宗

一、前 言

普魯士新教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¹是近代來華的關鍵外國人之一。做為第一個以私人身份進入中國內地的新教傳教士、《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者、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的中文秘書，以及

2018年12月6日收稿，2019年5月21日修訂完成，2020年1月14日通過刊登。

* 本文在寫作修改中，得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維江教授、心理學系井榮美子的重要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係德國杜賓根大學漢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1 Gutzlaff 的中文譯名有郭士立、郭實臘、居茨拉夫等多種，但他本人使用的中文名則一直是郭實獵，他的西文名亦有 Karl Gutzlaff、Charles Gutzlaff、Karel Gutzlaff 等多種。參見李驚哲，〈郭實獵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1: 138-148。

「漢會」(The Chinese Union)的建立者，²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郭實獵的行為又被人們視為「全然瘋狂」、「奇特」和「不可理喻」，³他的個性偏執，常遭人詬病，曾引發過諸多爭議。史萊達(Herman Schlyter)和魯晞珍(Jessie Lutz)曾用浪漫主義和虔信主義的影響來解釋郭實獵矛盾而又奇怪的行為和個性。⁴但他們的解釋無論是從宗教信仰、社會思潮還是個人欲望的角度，都很難對郭實獵的個性與人格進行全面、合理的解讀。蘇精於 2006 年發表〈郭實獵和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一文，⁵該文敘述的重點雖是郭實獵與其他傳教士在「漢會」問題上的衝突，但文中引用的倫敦會和美部會檔案卻包含了大量描述郭實獵怪異個性的內容，為我們理解郭氏的行為邏輯提供了珍貴的線索。本文擬利用現代心理學的理論與臨床診斷標準，梳理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力爭還原郭實獵的心智與人格的養成過程，為人們理解他的人格特徵提供一個有價值的視角。

二、童年遭遇與命運轉機

1803 年 7 月 8 日，郭實獵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Pommern)的小城佩日采(Pyritz)。⁶他的父親 Johann Jacob Gützlaff 是一位裁

2 前人研究一般稱漢會為「福漢會」，此名源自漢會早期成員王元琛所著《聖道東來考》，但並不見於本身的文獻。因《聖道東來考》作於王元琛晚年，距漢會解體已逾半個世紀，難以為信。故本文仍用該會一般文件中之自稱「漢會」。此名與該會的德文名 Chinesische Verein 也完全一致。

3 參見《倫敦傳教會檔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以下簡稱 LMS)，LMS/CH/SC, 5.2.A., Benjamin Hobson to A. Tidman, Canton, 20 August 1851.

4 參見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C. W. K. Gleerup, 1946);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2008).

5 蘇精，〈郭實獵和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收入氏者，《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頁 33-71。

6 參見《荷蘭傳道會檔案》(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以下簡稱 ANZ)，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1.

縫。⁷ 他的母親是 Johann 的第二任妻子，在郭實獵 4 歲時去世。一年以後，郭父再次續弦，娶的是另一位裁縫的遺孀。在郭實獵的回憶裡，這位後母的形象並不和善。1823 年，郭實獵曾經給荷蘭傳道會寫過一份長達五頁的德文自述，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自己 20 歲以前的生活狀況。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到他的童年經歷：

我的母親在我 4 歲時便去世了，儘管她對我很嚴厲，但也十分愛我。失去她使我非常傷心，當時我感覺所有人道的幫助都被奪走了。我同父異母的大姐像母親一樣細心地培養我，並且教會我拼寫字母。5 歲的時候，我有了後母，她在之後整整 8 年時間裡都野蠻地待我。對我而言，這是一段苦難和磨煉的日子，我的整個性格都因此而改變了，從活力十足變得憂鬱慘澹。⁸

西方學界對這段描述文獻並不陌生。1851 年在普魯士人所編的《郭實獵傳》（*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中就曾部分地復述過這一段文字。⁹ 待到 2008 年，魯晞珍在她的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中又依據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所藏的一個整理本，將之摘譯為英文。¹⁰ 與德文手稿相比，萊頓的副本雖然存在少量錯誤，但魯氏的英譯本仍舊較為準確地遵循了原文的大意。¹¹

7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Berlin: Haupt Verein für christliche Erbauungsschriften in den Preussischen Staaten, 1851), p. 1. 郭實獵的父親去世於 1825 年 12 月 9 日，參見“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135(1832.8.26): col. 1097.

8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1.

9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p. 1.

10 參見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11 在 *Opening China* 中魯晞珍也引用了這一段文獻的部分內容，但魯氏所引用的英文譯文“The eighth of my stepsisters reared me with motherly care and taught me my letters”與德文手稿的內容明顯有出入，似因魯晞珍所參考的文獻整理件有誤所致。從手稿的內容看，照顧郭實獵的這位大姐應該是他父親第一位妻子的女兒，並非出自郭氏的後母。參見：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p. 18.

這段譯文也隨著魯晞珍的著作廣為傳播，成為西方學者講述郭氏童年經歷的基本文獻。

事實上，早在郭實獵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之前，就有很多同時代的傳教士提起過郭氏的童年經歷。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曾指出，「他早年心智陶冶不足」，¹² 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秘書安德森(R. Anderson)也說過：「我真想知道他(郭實獵)早年的教育是否有什麼大缺陷，他似乎沒有真正的觀念」。¹³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現代心理學還沒有出現，但人們已經清晰地意識到，郭實獵的某些人格缺陷與他的童年經歷存在著密切的聯繫。

人在童年時期的經歷，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成年以後的人格特徵。不良的家庭教養方式會對兒童的成長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程度較輕時，會引起激烈的逆反或某些神經症(如焦慮、恐怖症等等)，嚴重時甚至會對人格基礎的塑造形成重大的影響，如果缺少有效的心理干預和幫助，則可能逐漸發展為人格障礙，即所謂的「病態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或異常人格(anomalous personality)」。¹⁴ 無論是與郭實獵同時代的傳教士，抑或是百餘年後的史家，大多只是概略地提及他的這段經歷，卻鮮有人關注過郭實獵的心智、個性和人格在這段困苦往事中具體變化和表現。

細究起來，郭實獵在青少年時期的很多行為，都與這段經歷存在明顯的聯繫。在郭實獵早期的個性中，冒進和逆反的特質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出生於虔信宗大盛的普魯士北部，其父就是一位非常虔誠的虔信宗信徒。¹⁵ 可郭實獵年滿 8 歲，才進入小學不久，¹⁶ 他就敢公然地指責校長在宗教課

12 參見《美部會檔案》(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以下簡稱 ABCFM), ABCFM/Unit 3/ABC 16.3.8, vol. 3, S. W. William to R. Anderson, Canton, 22 August 1851.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70-71。

13 ABCFM/Unit1/ABC 2.1, vol. 16, R. Anderson to R. Cole, Missionary House, Boston, 19 April 1852.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71。

14 傅安球,《實用心理異常診斷矯治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頁 132。

15 郭實獵的父親很可能在當時虔信宗大盛的哈勒(Halle)接受過教育。哈勒位於柏林西南部 130 公里的萊比錫盆地邊緣,哈勒大學是十八、十九世紀虔信宗的中心。

16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1. 按照郭實獵的自敘,他在學校中主要學習古德語、歷史、數學

上傳授的內容是「毒藥」，並且在「之後好些年」都「對聖經和宗教漠不關心」。¹⁷等到 10 歲上下的時候，他又「決心要從事政治，投身於整個歐洲與拿破崙專制統治的鬥爭」，¹⁸並且成天地做著白日夢，幻想自己在異域的「冒險」和「旅行」。¹⁹

13 歲時，郭實獵需要行「堅信禮」，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可是他居然在儀式之後公開質疑自己的信仰，而且還非常放肆地否認了自己的誓言：「那傳教士為我建立的信條，是永遠忠誠於美德的誓言，並接受上帝作我的父。但我很快便意識到，這些誓言，由於缺少神聖的精神力量，所以很少能將人從惡行中拯救出來。」²⁰緊接著，他又出人意料地拒絕了「接受市政府的資助以繼續學業的建議」，²¹舍優就劣，跑到什切青（Stettin）的匠人戈爾尼施（Gollnisch）手下，作了一名腰帶搭扣的學徒工。²²這些行為多少顯得有些偏執甚至恣肆。不良家庭教育環境似乎已經開始在郭實獵的身上產生副作用。

郭實獵的這些行為和他與繼母之間互動有關。對他而言，若想擺脫「苦難和磨煉的日子」，就只能離家遠走；但因為家境貧寒，所以做學徒又成了唯一的選項。不過，在作出決定之前，郭實獵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學徒的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麼。他所憧憬的，是廣闊的天地和自由的空間。然而，德意志學徒工的生活卻遠稱不上自由。他們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方法，與五百

等課程。

17 Issachar J. Roberts, "Early Life of Charles Gutzlaff, Missionary in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1839.1): 30. 羅孝全曾經與郭實獵同住過一段時間，該文中所述的這些細節，應來自郭實獵本人。

18 Ibid., p. 30.

19 Ibid., pp. 30-31.

20 在郭實獵的自述手稿上，關於堅信禮的文字旁邊，注有「1816 den 7tem Juli」，證明他接受堅信禮的準確時間是 1816 年 7 月 7 日。參見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p. 2.

21 Ibid.

22 *Karl Gu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p. 1.

年前很少差別」，²³「普遍缺乏現代生活條件」、「缺乏現代工業生產方法」，更「缺乏現代思想」。這裡的「全部生產制度，只是中世紀的遺跡」。²⁴

果然，在來到什切青之後不久，郭實獵就後悔了。他感受到內心「無法補救的」、「異常的空虛」，²⁵並且急於尋找方法擺脫這一處境。他先是避開師傅的監督，把一切的閒暇時光都花在了閱讀上，²⁶似乎是想尋找機會重回學校；後來又自稱因為「一位商人」、「分享的」《巴色雜誌》（*Basle Magazine*）而起過當傳教士的念頭，²⁷並且還為此與其父發生過一番激烈的爭執。²⁸但無論是讀書還是傳教，恐怕都是郭實獵突然閃過的念頭，過不了幾日就沒了下文。郭實獵的需求只是跳出困窘的學徒生活，至於之後何去何從，他好像並不特別在意，至少他沒有篤定要去傳教。

1820 年，趁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途經什切青之際，郭實獵和一位同伴向他獻詩，²⁹並由此受到威廉三世的接見和關照。當威廉三世表示可以滿足他們的願望時，郭實獵便提出要求，希望重返學校念高中。不久，郭實獵的同伴便因此升入文理中學（*Gymnasium*）繼續學業，而郭實獵卻因為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太少，無法獲得升學的資格。「人們不知道該如何安排他，因為他並不是學生，而僅僅是一名熟練工」。³⁰經過好幾個月的等待，威廉三世才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本來毫不起眼，而且僅有 8 名學生在冊的「柏林傳教學院」

23 林潤青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工人階級》（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頁 156。

24 同上註。

25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2.

26 參見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col. 1098;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27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2.

28 郭實獵的父親認為，「整個傳教事業只不過是宗教狂熱（*Schwaermerei*）」。參見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2.

29 郭實獵的這位同伴是一位傳教士的遺孤，後人常因此將此次獻詩與傳教聯繫起來。但事實上，二人獻詩的目的就是要設法重返學校，而並非外出傳教。

30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bung,” *Evangelisches Missions-Magazin* (1859): 453.

(Berliner Missionsinstitut)。³¹ 因為這所「學校」完全不需要規範的升學手續，威廉便於 1821 年 4 月將郭實獵招至柏林，³² 推薦到該校就讀，³³ 並且承諾每年資助這所學校 500 塔勒。³⁴ 威廉三世非常用心，但也是非常艱難地完成了他對郭實獵的許諾。

這一年，郭實獵剛好 18 歲，他終於脫離了童年時期的夢魘，遠離了繼母，重新回到了「學校」。但這個「命運的奇異轉機」³⁵ 卻和郭實獵的信仰毫無關係。在被文理中學拒絕以後，這所傳教士學校就成了他跳出學徒工生活的救命稻草。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郭實獵在 1821 年以前曾表露出從事傳教事業的堅定決心；也沒有任何資料表明，他在這一階段有過任何明確的人生理想或目標。他那些盲目而又艱難的抗爭，都是為了擺脫童年的陰霾和學徒生活的困苦。

童年時期的不良教養方式與生存處境，對郭實獵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他缺乏完整的基礎教育，而且不太能接受其他人的管束和訓導。年少時的夥伴形容他「好幻想」、「狂妄」、「暴躁」，他常有出人意料的想法或舉動，身邊的親友也拿他無可奈何。他行事好衝動、感情用事、冒進傾向明顯，而且有英雄主義情節，樂於尋求刺激的事物和成就感，總顯得逆反而又任性。郭實獵的這些个性和人格特徵是我們瞭解他行為邏輯的重要線索，而當他來到柏林之後，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又將為他帶來新的變化。

三、傳教士學校與虔信宗信仰

1821 年 5 月 7 日，³⁶ 郭實獵正式入學。所謂的「柏林傳教學院」，建

31 Karl Friedrich Ledderhose, *Johann Jänicke* (Berlin: Im Selbstverlage des Herausgebers, 1863), p. 205.

32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p. 455.

33 Karl Friedrich Ledderhose, *Johann Jänicke*, p. 205.

34 Ibid.

35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p. 453.

36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3. 在郭實獵的手稿上，記錄郭實獵來到柏林傳教士學院開始學習的部分文字旁邊，注有「1821 den 7tem Mai」。

於 1800 年。校長雅尼克（Johann Jänicke, 1748-1827）是一位虔誠信奉虔信宗的老人，他建立學校的目的，是為了紀念他在印度病逝的傳教士弟弟約瑟夫·雅尼克（Joseph Daniel Jänicke, 1857-1800）。這所學校雖然號稱德意志傳教士學院的濫觴，但由於普魯士的傳教事業要遠落後於英、法、荷蘭等國，所以學校本身的規模非常小，設施也很簡陋。1800 年初建時，該校只有 7 名學生，截止到 1843 年，從該校畢業的傳教士總共只有大約 80 人。³⁷ 與其說這是一所傳教士學院，倒不如說是一個小型傳教士培訓班。

報到那天，當校長雅尼克問及郭實獵此來的目的時，郭氏竟稱自己來此學習是「希望成為一名牧師」。尷尬之餘，雅尼克只好答道，「我們這裡不培養牧師，不過您儘管來」。³⁸ 在同學們眼中，郭實獵此刻尚不明白牧師與傳教士之間的差別，他「對基督教的認知有限，對於傳教的價值懂得更少」。³⁹

學校的課程包括宗教、英語和拉丁語。同時，雅尼克也鼓勵學生前往柏林大學旁聽或求教。不過，入學之後的郭實獵，似乎並沒有如他所稱的那樣要「成為牧師」。他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其他知識的同時，依舊對宗教表現得十分冷漠：

雄心勃勃的郭實獵在將學習放在首位的同時，卻缺少對基督教的真正領悟和理解……僅只是討論這些問題，也會被郭實獵看作浪費時間，他推脫說，其他傳教士學校的兄弟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而這些時間完全可以被更好地利用；沒錯，他覺得，仿佛有些人是因為他的勤奮而在嫉妒他。他自然不能對他的室友解釋，是因為他的勤奮，而使得他沒有時間投入到私人的或者公開的修行中。郭實獵經常會因此而成為他的兄弟們談論的對象。人們佩服他的勤奮，卻也惋惜於他的傲慢與狂妄，還有他對真正的傳教使命感（*eigentlichem Missionssinn*）的缺乏。⁴⁰

對宗教的冷漠暴露了郭實獵進入傳教士學校的真正動機。他想要學習的是

37 參見 Karl Friedrich Ledderhose, *Johann Jänicke*.

38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p. 455.

39 Ibid.

40 Ibid., pp. 455-456.

其它知識，而非宗教。不過，郭實獵這種漠視宗教的狀態沒能維持太久。由於長期處於虔信宗教徒的包圍中，⁴¹ 他很快便在信仰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在一次與同學的激烈爭論之後，郭實獵對於信仰的糾結和痛苦終於爆發了出來：

（郭實獵撇開周圍的同學）自言自語地敘述著他自幼年開始就犯下的罪過，並且大喊：「是，撒旦，你把我拖進了你的陷阱之中，讓我此刻站在深淵的邊緣，要使我陷入永久的腐朽。你用驕傲和浮華把我填滿，讓我濫用最神聖的東西，而眼中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和空洞的自尊。哦！你是多麼的狡猾，現在你贏了，把我推進了萬劫不復的地獄。」他像這樣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他的朋友嘗試與他親熱地交談，並讓他留心福音的預兆時，他又大聲地叫起來：「是，那對我沒用！不，我進不了天堂了！我得不到寬恕！我的罪孽太深重！我迷惑了我自己！完全陷入了撒旦的羅網！我輸了，輸了！地獄已經張開了它的大口，我馬上就會成為它的獵物！」⁴²

郭實獵自己羅列的「驕傲和浮華」、「空洞的自尊」、「自己的利益」都可以視為極好的心理分析素材。面對信仰的困惑，當那些「空洞的自尊」突然坍塌的時候，崩潰的情緒便會傾瀉而出。這類近乎瘋狂的表現和極端的行為往往無法偽裝或掩飾，同時也非常容易使人聯想到虔信宗信徒對於信仰「強烈的、內在的、懺悔的掙扎」（Busskampf）和自省的要求。

在麥克·葛雷哥里奧（Michael Gregorio）的哲學小說《謀殺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riminal Reason*）中，有一段對 Busskampf 的解讀非常形象，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郭實獵此時激烈的情緒：

虔信派信徒依他們對《聖經》所作的解讀，相信唯有個人親自和魔鬼、和魔鬼的誘惑有過親身的戰鬥，才能永遠得救，他們甚至為此自創出一個詞來—Busskampf，依他們的宣道，這是每一位真正悔改信主的人都要經過的內心掙扎，唯有戰勝之後，才能進入天國。⁴³

41 郭實獵身邊的絕大部分師友都信奉虔信宗（pietism）。他的寄宿家庭，也信奉屬於虔信宗的主護教派（Hermhutismus）。參見 Reichardt, “Gützlaß’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p. 455.

42 Ibid., p. 457.

43 （英）麥可·葛雷哥里奧（Michael Gregorio）著，宋偉航譯，《謀殺理性批判》（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9），頁 78。

郭實獵對於信仰的糾結，帶有濃厚的虔信宗色彩。極度掙扎的情緒也說明他對基督教的態度轉變並非矯飾，而是發自內心的反思。造成郭實獵思想轉變的主要原因很可能來自雅尼克對他的善待。對於這位童年飽受折磨，又備嘗學徒生活艱辛的青年來說，傳教士學校的氛圍要友善得多。郭實獵曾說：

通過與虔誠的傳教士雅尼克的相處，以及其他傳教兄弟的告誡，主感動了我的心。我看到了我的罪與不幸，並乞求耶穌憐憫我；仁慈的耶穌沒有讓我落入死亡之谷，他接受了我的乞求，並赦免了我的罪。⁴⁴

大約在 1821 年 6、7 月間，⁴⁵ 郭實獵便放棄了他對宗教的抗拒立場，「第一次發自內心地正真拜倒在救世主的足下」。⁴⁶

不過，郭實獵的信仰似乎一直都是人們爭議的焦點。史萊達曾根據郭實獵於 1822 年 12 月 22 日所作的一次佈道指出，⁴⁷ 郭實獵不但虔誠，而且深受虔信主義與福音主義的影響。⁴⁸ 衛三畏也承認，郭實獵雖然性格「前後不一」，卻仍懷著「對基督徒正直的執著」。⁴⁹ 不過，有更多的傳教士或學者卻都表達過對於郭實獵個人行為、信仰的憤懣和懷疑，他們認為郭實獵極端의思想和言行並不符合基督教信仰。馬禮遜（Robert

44 ANZ, 1102-1.1.2.2.7.1.3.804, Kurzgefaszte Lebensbeschreibung von 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p. 4.

45 Ibid., p. 4. 郭實獵在手稿上有自注「1821 年 6、7 月」。

46 Ibid., p. 4.

47 史萊達已經注意到這次佈道的主題為「我們的主，作為得救的唯一途徑」（unsern Herrn, als den einzigen Weg zur Seligkeit, und zwar I. wie Er der Weg ist, und II. wie Er es uns wird）。郭實獵在佈道時曾引用《使徒行傳 4.12》說，「除他（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表明了他的虔信宗信仰。參見《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香港：香港聖經公會，2006），頁 188；Karl Gützlaff, *Predigt über Apostelgeschichte 4, 12 gehalten am 22. Dezember 1822 in Berlin* (Berlin, 1844), p. 4.

48 史萊達稱，郭實獵的宗教信仰來自「亨胡特主義與福音主義（der Herrnhutismus und der Evangelikalismus）兩種思潮」。而亨胡特主義其實就是虔信主義的一個分支。參見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19.

49 ABCFM/Unit 3/ABC 16.3.8, vol. 3, S. W. William to R. Anderson, Canton, 22 August 1851.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71。

Morrison, 1782-1834) 曾說「我希望他有虔誠的信仰及可敬的真理知識」,⁵⁰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也批評「他的虔誠也遭到有些傳教士的質疑」,⁵¹ 羅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 的指責則更直接：

他沒有接受過虔誠的教導，所受的教育來自自然神論和蘇西尼派的教義，他不喜歡祈禱會，不與虔誠的基督徒交往，也沒有感到天然傾向於這些人。⁵²

在這裡，有必要對郭實獵的信仰問題作一番辨析。郭實獵信仰的虔信宗是路德宗 (Lutheranism) 的一個分支。與普通的路德宗不同，虔信宗信徒並不關心教義，而是重視靈性，強調禁欲和嚴格舍己的生活。「對於不會講自己得救經歷的人，則一概不承認他們是基督徒。」正如羅孝全所說，郭實獵的信仰「在這個開明的時代中顯得十分過時」。⁵³ 十九世紀以來，很多基督教的其他宗派都將虔信宗視為過時和落後的象徵。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1886-1968) 就認為：「與教會一同下地獄都比跟敬虔主義者一起上天堂強，儘管他們的天堂根本不存在！」⁵⁴ 無論是在歐洲大陸還是在北美，因為宗派差異的緣故，虔信宗信徒與其他很多宗派之間都發生過激烈的衝突。郭實獵在信仰方面受到的質疑，顯然與這些宗派之間的差異有關。

另一方面，郭氏本人的個性又極鮮明。他「傲慢」、「猖狂」的行事風格很容易為自己帶來非議。而且絕大多數傳教士對於郭實獵信仰的質疑都

50 LMS/CH/SC, 3.1.C., Extract from Robert Morrison's private to W. A. Hankey, Macao, 10 February 1832.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36。

51 ABCFM/Unit 3/ABC 16.3.8, vol. 1A, E. C. Bridgman to R. Anderson, Macao, 12 August 1841.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49。

52 Issachar J. Roberts, "Early Life of Charles Gutzlaff, Missionary in China," p. 31.

53 Ibid.

54 Dale W. Brown, *Understanding Pietism* (Nappanee, IN: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1996), p. 11. 另參見陳企瑞，〈論敬虔主義者弗蘭克的信仰實踐〉，收入許志偉主編，《基督教思想評論》第 11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134-143。

發生在他們的關係惡化之後。這並不是說傳教士們的批評不真誠，但是，當宗派之間的認知差異和帶有情緒的評價疊加在一起的時候，這些批評本身的客觀性就很值得懷疑。畢竟，信仰不虔誠和「信仰落後於時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虔信宗的信仰是郭實獵此後近三十年傳教活動的底色，對於這樣一位極其複雜的歷史人物而言，忽略宗派之間的衝突，忽略其個性與心理特徵，特別是在忽略其人格特徵的情況下，就去質疑他的信仰、價值觀和人生選擇，都是存在風險的。

四、浪漫主義與人格障礙

要討論郭實獵的價值觀與人格特徵，就不能不從浪漫主義說起。多數前輩學者都傾向使用「浪漫主義」的影響來解讀郭實獵的行為。無論是史萊達還是魯晞珍都非常重視郭實獵在柏林期間所受的浪漫主義薰陶。他們認為，正是浪漫主義的那種「舍我其誰，敢於造反」⁵⁵的理想強化了郭實獵「在早年就已經顯露出來的個人主義傾向，塑造了他獨來獨往的個性」。⁵⁶而在郭實獵所處的環境，以及他的經歷中，我們確實能夠察覺到一些浪漫主義的痕跡。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是浪漫主義在歐洲盛行的時期。柏林以及新成立不久的柏林大學，正是這股思潮的重要中心。在來到柏林後，郭實獵不但住在柏林大學附近，而且一度起意試圖報考這所學校。比如他在柏林，除了跟隨雅尼克學習之外，也長期追隨尼安德（Johann August Wilhelm Neander, 1789-1850）和托盧克（Friedrich August Gottreu Tholuck, 1799-1877）兩位老師，⁵⁷此二人不但都曾擔任柏林大學的教授，而且還深受反理性主義

55 （英）伯林（I. Berlin）著，呂梁等譯，《浪漫主義的根源》（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110。

56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21.

57 Karl Gützlaff, *Gaihan's Chinesi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ss des Jahres 1846* (Cassel: der Expedition der Chinestscher stiftung, 1850), p. 26. Johann August Wilhelm Neander 是教會史學家，自 1813 年起任柏林大學教授；郭實獵的波斯語老師 Friedrich August Tholuck 在 1824 年獲聘為柏林大學編外教授（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並於兩年後，由普魯士大臣阿爾騰施泰因授意，轉任

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覺醒神學」(Erweckungstheologie)的形成過程中，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⁵⁸ 特別是托盧克，他還專門輔導郭實獵學習過波斯語。⁵⁹

但是，除了這些涉及浪漫主義的間接證據之外，郭實獵本身似乎還具有一些比浪漫主義更重要的屬性。在郭實獵身邊的同事或朋友筆下，他的個性和行事風格要比普通的浪漫主義者誇張得多。在同學們眼中，郭實獵「傲慢」(stolz)又「狂妄」(eigendünkel)，「他覺得，仿佛有些人是因為他的勤奮而在嫉妒他」(auf ihn wegen seines Fleißes neidisch wären)。⁶⁰

在衛三畏眼中：

郭實獵是罕見性格複雜的人，很難令人理解。他的性情非常樂觀，而他的狂熱充溢到讓他看事情會變成扭曲的程度，即使別人較為清醒冷靜，他也不願接受別人的修正意見。想努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不久就會在取悅他和滿足自己之間陷入兩難，只好離開，以致最後沒有傳教士和他有什麼來往。也許可以說，他是個不能令人滿足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是有些優良的特質和要素，卻混雜著前後不一和對基督徒正直的執著，以致於他的一切作為都顯示出心理上的錯綜複雜與懷疑，他早年心智的陶冶不足是導致後來錯誤行為的重要原因。⁶¹

而馬禮遜在 1832 年寫給倫敦傳到會秘書 W. A. Hankey 的私人通信中，也對郭氏作過類似的評價：

哈勒大學教授，以「消滅那裡的理性主義」。參見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19;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p. 461; (德)潘能柏格(Wolfhart Pannenberg)著，李秋零譯，《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香港：道風書社，2010)，頁 78。

58 (德)潘能柏格著，李秋零譯，《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賴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頁 78。

59 郭實獵在柏林期間學習的語言一共有六門之多。參見"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col. 1100.

60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p. 456.

61 ABCFM/Unit 3/ABC 16.3.8, vol. 3, S. W. William to R. Anderson, Canton, 22 August 1851.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70-71。

他（郭實獵）充滿日爾曼人的性格：熱誠有餘而孤僻不群、任性執拗而倔強自負（*enthusiastic and eccentric, willful and wayward*）。我擔心他不能善與人共事，作為第二名，他不服從人（*insubordinate*）；作為第一名，他專斷凌人（*domineering*）。他不慣社交場合的玩笑，不過近來似乎有所改善。⁶²

此類記載非常多見，無論是二十年代的文獻，抑或是郭實獵更加活躍的三十年代，雖然表述各異，其內容卻相差無幾，都反映出郭實獵極端、狷狂、暴戾的行事風格。有人甚至在私下指責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狂熱分子」。⁶³顯然，郭實獵的很多表現，儘管具備浪漫主義的某些特徵，卻顯得極不正常，甚至暴露出某些嚴重的病態。

如果我們將這些紀錄與現代心理學研究相參照，便會發現：郭實獵的行事風格與人格特徵都非常接近於「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的臨床表現。此類心理疾病的研究在相關領域已經非常成熟。心理學界權威的《牛津精神病学教科書》中，對該類患者的主要症狀有如下一段描述（序號為筆者所加）：

（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①過於自負、自命不凡、妄自尊大。②他們沉湎於巨大的成功、權利、美貌或聰明才智的幻想之中。③他們認為自己與眾不同，④期望別人羨慕自己，並給予他們特殊的待遇。⑤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享有最好的東西，並力圖與地位顯赫的人物拉上關係。⑥他們利用別人而不顧及其感受，⑦也不對其抱以同情。⑧他們嫉妒他人擁有的財產和取得的成就，同時期望別人以同樣的方式嫉妒自己。⑨他們顯得傲慢、目空一切、驕傲自大，好以恩人自居或以恩賜的態度待人。⁶⁴

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按照筆者所列的序號，將這段

62 LMS/CH/SC, 3.1.C., Extract from Robert Morrison's private to W. A. Hankey, Macao, 10 February 1832. 譯文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頁 36。

63 LMS/CH/OL, A. Tidman to J. Legge, London, 24 December 1849.

64 （英）格爾德（Michael Gelder）、（英）梅奧（Richard Mayou）、（英）考恩（Philip Cowen）原著，劉協和、袁德基主譯，《牛津精神病学教科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頁 166。

描述劃分為九條判定標準，並以此作為「自戀型人格障礙」的診斷依據。⁶⁵在診斷時，對方只要符合其中的五條特徵，即可被初步判定為病患。⁶⁶

在上節所引的自述中，郭實獵曾懺悔自己「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和空洞的自尊」，「填滿」了「驕傲和浮華」；如果我們再聯想到他從童年時期就已經具備的「好幻想」、「狂妄」、「傲慢」、「暴躁」等特徵，那麼，除了「期望別人以同樣的方式嫉妒自己」這一條判定標準，因為缺乏郭實獵本人的直接供詞而顯得模稜兩可之外，其它的內容在相關文獻中都能找到較為明顯的印證。郭實獵的行為與「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典型的臨床表現極為接近。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人格障礙的生成機制。所謂的「自戀」，其實是「在童年自體的心理結構的獲得性缺陷以及隨之而來的繼發性防禦與代償性結構的建立」，⁶⁷它們大多源自童年時期因遭受虐待或缺乏安全感而引起的恐懼或自卑。像郭實獵這類在童年時期有過嚴重受虐經歷的人，恰恰是「自戀型人格障礙」的高發人群。這種心理疾病「通常開始於童年、青少年或成年早期，並一直持續到成年乃至終生」；⁶⁸在缺少有效心理介入的情況下，患者可能終身受其影響而難以自拔。這類病人會將「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對自己的崇拜上」。⁶⁹正如郭實獵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們對現實之外的世界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並需要不停地尋找新的刺激點

65 根據國際通行標準，人格障礙一般劃分為 A、B、C 三個群組，共十種類型。「自戀型人格障礙」與「反社會型」、「邊緣型」、「表演型」人格障礙同屬 B 群，這幾類人格障礙的患者有很強的相似性，一般都共同具有「情緒化、不穩定、戲劇化和過度表現」等特徵。概括起來說，所謂「自戀型人格障礙」就是「一種需要他人讚揚且缺乏共情的自大（幻想或行為）的普遍模式」。參見美國精神醫學會著，張道龍等譯，《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658。

66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中文文字表述與《牛津精神病學教科書》有細微差別，但含義完全一樣。參見美國精神醫學會著，張道龍等譯，《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頁 658。

67 （美）克雷爾（M. S. Clair）著，賈曉明等譯，《現代精神分析「聖經」——客體關係與自體心理學》（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2），頁 189。

68 張瑞星，沈鍵主編，《醫學心理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5），頁 151。

69 （美）卡倫·霍尼（Karen Horney）著，辛怡譯，《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123。

和成功的快感。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自戀的緣故，而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對抗屈辱感和無足輕重感……恢復被壓碎的自尊心」。⁷⁰ 其實，郭實獵青少年時期的大多數行為，無論是公然地攻擊校長和宗教，幻想「對抗拿破崙」，抑或是放棄學業前往什切青作學徒，都和他內心深處這種對抗「屈辱感和無足輕重感」的需求有著緊密的聯繫。

他那些冒進的、衝動的、英雄主義的人格特徵，看上去似乎是浪漫主義的典型表現，而事實上卻是內心扭曲的變態反映。浪漫主義可能對郭實獵產生過影響，但這種影響可能只是強化了郭氏本身就已經非常強烈的對於成功的渴望，並使之變得更強烈、更急切，甚至更扭曲。換言之，郭實獵行事的基本邏輯，就是要不惜代價地使自己功成名就，在最快的時間內成為最耀眼的明星。

1823 年初，郭實獵在經歷了一場重病之後，⁷¹ 自稱收到上帝的指示，⁷² 要求前往「遙遠的異域」傳教。⁷³ 他隨後被雅尼克送往位於鹿特丹 (Rotterdam) 的荷蘭傳道會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服務，終於踏上了充滿挑戰的傳教旅程。⁷⁴ 客觀地說，郭實獵狷急的個性並不適合從事傳教工作。那麼，當他來到荷蘭，開始傳教實踐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呢？

五、無可奈何的使命

1823 年 6 月 5 日，郭實獵到達鹿特丹，⁷⁵ 開始接受荷蘭傳道會在出發之前的培訓。此間，郭實獵學習的主要課程除了宗教外，還包括英語、

70 同上註，頁 123-124。

71 Karl Gützlaff, *Die Mission in China: Vorträge in Berlin gehalten von Dr. C. Gützlaff*, (Berlin, 1851), pp. 4-5.

72 Ibid.

73 Ibid.

74 郭實獵最早一次提出要前往海外傳教是在 1822 年 5 月 15 日。他在給一位名叫 Ercellenz 的省長 (Oberpräsident) 的信中表示，他努力的目的就是要成為一名基督帝國的福音傳教士 (für Christi Reich eine Evangelist zu werden)。但是，他做出上述表態的動機和背景，尚不完全明確。參見“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col. 1100.

75 Ibid.

荷蘭語、馬來語以及有限的醫學。荷蘭傳道會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將郭實獵派往荷屬東印度群島傳教。⁷⁶ 這裡是十九世紀以來荷蘭最大、最重要的殖民地，也是荷蘭傳道會派遣傳教士的主要目的地。但荷蘭人很快就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1824 年 4 月 19 日，前往希臘參加獨立戰爭的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在邁索隆吉翁病逝，從而引發了西方輿論對希臘獨立運動強烈的同情。時隔不久，郭實獵便在一位名叫 Hilarion Paschalides 的希臘牧師的引導下，立誓「投身」於希臘的「解放」事業，不但把前往東南亞的計畫忘得乾乾淨淨，並且堅持要求荷蘭傳道會將他派往地中海地區。⁷⁷

對於郭實獵而言，希臘的魅力要遠大於東印度群島。希臘素來是浪漫主義者的精神家園，拜倫亦被西方世界追捧為「追求自由與理想的英雄」、「浪漫主義的偶像」。到戰亂頻發的地區傳教，可以刺激郭實獵的神經，滿足他的英雄主義情結；更重要的是，這使他有機會迅速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贏得榮譽和尊嚴。

郭實獵甚至在一封信中非常堅決地表達過自己投身希臘事業的決心：

我已準備好為他們（希臘人）奮鬥至死，更會千方百計地以福音給他們啟示。⁷⁸

郭實獵揚言要「奮鬥至死」，這種義無反顧的情緒，讓人懷疑他究竟是想去希臘傳教，還是參戰？但荷蘭的教會並不希望郭實獵去希臘。荷蘭傳道

76 1824 年 3 月，馬禮遜返回倫敦。荷蘭傳道會曾力邀馬禮遜參加他們於 1824 夏天舉行的年會，並準備在期間將郭實獵引薦給馬禮遜，使郭實獵能夠前往英華書院（原文作 Chinesisch Missions-Institute）工作。可惜，此事因馬禮遜未能到會而作罷。需要注意的是，荷蘭傳道會此舉的目的，究竟是希望郭實獵在馬禮遜處學習漢語，還是對當地的馬來人傳教，尚不清楚。參見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25;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135(1832.8.26): col. 1101.

77 參見《聖公會傳教會檔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以下簡稱 CMS），CMS/G/AC15/64/5, Charles Gu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18 October 1825.

78 CMS/G/AC15/64/3, Charles Gu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1 July 1825.

會對巴爾幹和中近東的穆斯林本來就沒有興趣，⁷⁹ 更不願意去培養希臘事業的革命者。他們需要的，是在老殖民地中規中矩、按部就班的傳教士。

在前往希臘的要求被荷蘭傳道會否決之後，郭實獵迅速地將目光轉向了法國和英國。他於 1825 年夏天⁸⁰ 和 1825 年的 10 月下旬，先後以假期⁸¹ 和聖公會的邀請為名，⁸² 訪問了法國和英國。他訪問的目的，名義上是搜集學習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義大利語的資料，⁸³ 但實際上，卻是要繞開荷蘭傳道會，獨自爭取巴黎福音傳道會（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vangéliques de Paris）和英國聖公會的支持和資助。

為此，郭實獵還將一份長達十二頁的傳教計畫，分別提交給了法、英兩國的差會。⁸⁴ 這份龐大的計畫共計九條，大致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

- （一）救世主即將從撒旦手中解放東方。我們應該依靠神聖的諾言，並為天堂的指引而不斷祈禱。
- （二）東方的基督教會和穆斯林長期被大部分的基督徒所忽視。我們應當出版各種語言的著作描述他們的不幸，並為基督徒與那些穆斯林進行宣講，以引起人們的重視。

79 CMS/G/AC15/99/5, B. Ledebøer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7 October 1825.

80 史萊達認為郭實獵前往巴黎的時間是 1824 年秋。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29; 魯晞珍則認為，這一時間是 1824 年春。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p. 32. 前者依據的是後世報紙上的二手資料，後者則完全沒有出注。事實上，郭實獵到達巴黎的時間應在 1825 年 7 月 22 日之前不久。在他 1825 年 8 月 10 日給 Coates 的回信中，明確地寫著“‘When your letter of 22 July arrived I was already at Paris.’”郭實獵在巴黎停留了大約一個多月，他離開巴黎的時間應在 8 月 24 日前後。參見 CMS/G/AC15/64/4, Charles Gü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Paris, 10 August. 1825.

81 CMS/G/AC15/64/3, Charles Gü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1 July 1825.

82 CMS/G/AC15/64/4, Charles Gü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Paris, 10 August. 1825.

83 Ibid.

84 郭實獵寄給聖公會的這份計畫，現保留在「聖公會非官方檔」（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Unofficial Papers）中。在法國福音傳道會在寫給聖公會的介紹信中，也提到郭實獵曾向他們展示這份計畫。參見 CMS/G/AC14K/3, Letter from Paris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Paris, 24 August 1825; CMS/G/AC15/64/5, Charles Gü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18 October 1825.

- (三) 聯繫萊比錫的書商，為希臘的福音傳教士提供鉛印出版物。
- (四) 為實現上述計畫，須在所有基督教國家成立相應的差會。並建立一支由熟悉東方語言的志願者組成的傳教士隊伍。
- (五) 「東方只能被東方人收回」，在德意志的 Barmen（此地為萊茵傳道會，即巴冕（勉）會總部所在地）和東方分別建立針對東方人的教育機構。使他們真正皈依，並學習神學知識。⁸⁵

很難想像這是一位年僅 22 歲，甚至連衣食都需要他人供給的年輕人所制定的傳教計畫。郭實獵學習希臘語的時間並不長，而且很可能只認識 Paschalides 一個希臘人，可他居然想調動整個歐洲的力量在希臘傳教。這一方案既缺乏必要的物質支持，也沒有長期有效的實施步驟，任何思維正常的人都看得出來，這個龐大又空洞的計畫簡直就是一個白日夢。由於郭實獵行事過於張揚，他前往英國的計畫甚至引發了荷蘭傳道會對聖公會的抗議。⁸⁶ 最後，法、英兩方面也都沒有接受郭實獵的意見。人們不相信郭實獵會成功，也沒人能按照郭實獵的計畫，提供如此大規模的支援。

但是，郭實獵並不覺得這樣的計畫遙不可及。「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有「一種頑固的、非理性的權力理想，這種理想使他們相信：他們應該能夠駕馭一切，無論是多麼困難的處境，他都應該立刻就能對付它」。⁸⁷ 這類病人的「野心不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是要使自己顯得獨一無二，卓爾不群。」⁸⁸ 這個希臘計畫的「獨一無二」與「卓爾不群」似乎恰恰是郭實獵四處碰壁的原因。

郭實獵的這次失敗的英國之行，廣為後世學界所重視。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希臘計畫。大多數研究都一味地強調，郭實獵在倫敦結

85 CMS/G/AC15/64/5, Charles Gu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18 October 1825.

86 在郭實獵啟程前往英國之前，荷蘭傳道會已經致函聖公會，不但拒絕派遣他前往希臘，而且明確表示「仍舊希望他留下繼續服務」。這封信的用語非常嚴厲，明顯表現出荷蘭人對聖公會干涉己會事物的不滿。參見 CMS/G/AC15/99/5, B. Ledebor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7 October 1825.

87 (美) 卡倫·霍尼著，辛怡譯，《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頁 119。

88 同上註，頁 137。

識了著名的傳教士馬禮遜和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⁸⁹ 甚至進一步推測，他在馬禮遜創辦的「倫敦語言傳習所」⁹⁰ 見到了他後來的傳教夥伴湯雅各（Jacob Tomlin, 1828-1834）以及妻子李瑪環（Maria Netwell）。⁹¹ 這些研究甚至斷言：郭實獵是通過和馬禮遜等人的交往，才堅定了他東來亞洲，並最終立志在中國傳教的決心。

相關學者沒有對上述說法的依據進行過說明。唯一一條可能的證據，來自《泰晤士報》於 1834 年對郭氏所著《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的評論。該文稱：

在馬禮遜先生從中國前往英國的旅行途中，他與郭實獵先生有過一次意外的會面，他的辛勞傳教和巨大的文學成就，似乎將郭實獵先生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國。⁹²

不過，書評中的這些內容，在一手文獻中找不到相應的佐證。在《馬禮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中，郭實獵的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 1829 年。而在馬禮遜與郭實獵交往的各種紀錄中，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的相識早於 1825 年。至於郭實獵首次遇見湯雅各的時間則是 1827 年 9 月前後，地點在新加坡附近的民丹島（Bingtan）。⁹³

89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0. 另見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80-81；（普）郭實獵著，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香港：橄欖出版公司，2013）。

90 此為馬禮遜利用回國休假的機會在倫敦建立的中文學校。有關這所學校的詳情可參見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

91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p. 33.

92 “Mr. Gutzlaff’s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The Times* (London), 26 Aug. 1834: 5.

93 Jacob Tomlin,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Written During Eleven Years’ Residence and Travels Amongst the Chinese, Siamese, Javanese, Khassias, and Other Eastern Nation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Edinburgh: Oliphant; Glasgow: Collins and Bryce; Dublin: W. Curry and Co.; Dublin: J. Robertson and Co., 1844), p. 28.

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郭實獵是否在倫敦見過馬禮遜，而在於他東來之前是否對中國產生過興趣。郭實獵在此期間最重要的荷蘭語作品《基督教王國全球擴張史》（*Geschiedenis der uitbreiding van Christus Koningrijk op aarde*）中，使用了相當龐大的篇幅來讚揚馬禮遜的功績。在該書附錄的聖經經文對照表中，羅列的語言包括阿拉伯語、阿拉米語、馬來語、耳其語、喀什米爾語、印地語、緬甸語、塞內加爾語、爪哇語、卡爾穆克語、孟加拉語和現代希臘語，達十二種之多，卻偏偏缺少了馬禮遜最擅長的中文。⁹⁴ 就連郭氏自己也說過，「在剛剛抵達亞洲時，我並沒有考慮過要為中國去工作」。⁹⁵ 這似乎可以證明，郭實獵的英國之行與馬禮遜沒有關係，⁹⁶ 與中國也沒有關係。

選擇希臘而不是中國或東南亞，這是郭實獵所處的環境、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氛圍，以及他急功近利的個性共同促成的必然結果。1826 年 5 月 8 日，即便是在「被指定前往蘇門答臘」之後，郭實獵仍然依依不捨地寫信給聖公會，要求把他「在歐洲剩餘的日子都用到希臘的事業上」。⁹⁷ 多年以後，當他回憶自己「為了教會的利益」放棄希臘東來的歷程時，依舊遺憾地表示，這一選擇讓他「少了許多冒險」。⁹⁸ 對他而言，前往東南亞的旅程實在是個迫不得已的選擇。

1826 年 7 月 20 日，郭實獵被授予神職。⁹⁹ 9 月 11 日，他最終登船

94 參見 Karel Gutzlaff, *Geschiedenis der uitbreiding van Christus Koningrijk op aarde* (Rotterdam: Contze and Overbroek, 1828).

95 此語見郭實獵 1850 年 4 月於布魯塞爾 (Brüssel) 的一次演講，轉引自 Herman Schlyter, *Karl Gu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5.

96 郭實獵曾向荷蘭傳道會解釋，他應 Coates 邀請前往英國的目的是「收集有關希臘行動可能性的資訊」。在遭到荷蘭傳道會否決之後，郭氏才無奈以「獲取馬來語的新學習資料」的托詞勉強換取了前往英國的許可。在他向荷蘭傳道會相關負責人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確實「提及了馬禮遜」，卻從未保證要拜訪此人。參見 CMS/G/AC15/99/5, B. Ledeboer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7 October 1825.

97 CMS/G/AC15/64/7, Mr. Chs. Gutzlaff to Mr. Bickersteth, 8 May 1826.

98 Karl Gutzlaff, *Gaihan's Chinesi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ss des Jahres 1846*, p. 26.

99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58.

出發，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¹⁰⁰

的確，郭實獵一直嚮往著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冒險。與荷蘭傳道會的衝突，為他日後脫離差會獨立傳教埋下了重要的隱患，也向我們全面、清晰地展示出了他特立獨行的人格。郭實獵對於冒險的嚮往和他大而無當的希臘計畫，都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後來在中國沿海的航行，以及十八世紀四十年代的「漢會」。很多事情，似乎都是註定要發生的。

六、餘 論

不瞭解郭實獵的童年經歷，就無法還原他的人格特徵；不還原他的人格特徵，就無法理解他那些奇怪的行為或選擇。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和臨床診斷標準，為我們解讀歷史人物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這一視角的優勢在於將量化後的心理學指標用於歷史人物的人格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更準確地捕捉歷史人物的心理變化和心理訴求。心理學的成熟研究和量化的理論體系，也使得上述研究更具客觀性。但由於歷史文獻僅能提供臨床心理學初步診斷時所需的依據，而無法令歷史人物穿越時空來到當下，完成更加嚴謹的心理測試。所以此類研究，僅能提供心理學的初步診斷結果，以作研究參考，卻無法為古人確診。這是研究過程中仍需謹慎對待的地方。

具體到郭實獵來說，他信仰虔誠，卻並不謙卑；他勇於冒險，卻行事瘋狂；他善於實踐，卻好大喜功。由於此人的個性過於鮮明，使得我們很容易發覺他的心理特徵。他波折的童年、盲目的追求、狂熱的思維、偏執的理念，以及對成功異乎尋常的執著和渴望，都異於常人，卻高度契合「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在各個臨床階段的典型特徵。上述借助心理學理論得出的結論，顯然要比簡單依靠浪漫主義或宗教信仰來解釋郭實獵的視角要來得生動和具體。這些心理特徵似乎正是郭實獵在鴉片戰爭前後十餘年間能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因素，也是我們理解這位關鍵來華西人的重要線索。

100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以時間先後排序）

Gutzlaff, Karel, *Geschiedenis der uitbreiding van Christus Koninkrijk op aarde*. Rotterdam: Contze and Overbroek, 1828.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135(1832.8.26): col. 1097-1103, 1832.

Gutzlaff, Charles,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Mr. Gutzlaff’s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The Times* (London), 26 Aug. 1834: 5, 1834.

Medhurst, W. H.,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26, Paternoster Row, 1838.

Morrison, E. 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Roberts, Issachar J., “Early Life of Charles Gutzlaff, Missionary in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1839.1): 30-31, 1839.

Gützlaff, Karl, *Predigt über Apostelgeschichte 4, 12. gehalten am 22. Dezember 1822 in Berlin*. Berlin, 1844.

Tomlin, Jacob,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Written During Eleven Years’ Residence and Travels Amongst the Chinese, Siamese, Javanese, Khassias, and Other Eastern Nation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Edinburgh: Oliphant; Glasgow: Collins and Bryce; Dublin: W. Curry and Co.; Dublin: J. Robertson and Co, 1844.

Gützlaff, Karl, *Gaihan’s Chinesi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ss des Jahres 1846*. Cassel: der Expedition der Chinesischer stiftung, 1850.

Gützlaff, Karl, *Die Mission in China: Vorträge in Berlin gehalten von Dr. C. Gützlaff*. Berlin, 1851.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Berlin: Haupt Verein für christliche Erbauungs-Schriften in d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51.

Reichardt, “Gützlaff’s Eintritt in die Missionslaufbahn und seine Erwerckung.” *Evangelisches Missions-Magazin* (1859): 450-461, 1859.

Ledderhose, Karl Friedrich, *Johann Jänicke*. Berlin: Im Selbstverlage des Herausgebers, 1863.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二、檔案

《倫敦傳教會檔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荷蘭傳道會檔案》(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Utrecht: Het Utrechts Archief.

《美部會檔案》(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Cambridge, MA: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聖公會傳教會檔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Birmingham: Cadburg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三、近人論著

2006 《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 香港: 香港聖經公會。

(美) 卡倫·霍尼 (Karen Horney) 著, 辛怡譯 2011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南京: 譯林出版社。

列島編 1958 《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 北京: 三聯書店。

(英) 伯林 (I. Berlin) 著, 呂梁等譯 2011 《浪漫主義的根源》, 南京: 譯林出版社。

(美) 克雷爾 (M. S. Clair) 著, 賈曉明等譯 2002 《現代精神分析「聖經」——客體關係與自體心理學》, 北京: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宋莉華 2010 《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鵬哲 2018 〈郭實獵姓名考〉, 《近代史研究》2018.1: 138-148。

林潤青主編 1986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工人階級》, 北京: 工人出版社。

美國精神醫學會著, 張道龍等譯 2015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 (第五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英) 格爾德 (Michael Gelder)、(英) 梅奧 (Richard Mayou)、(英) 考恩 (Philip Cowen) 著, 劉協和、袁德基主譯 2004 《牛津精神病學教科書》,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 郭實獵著，黎子鵬編注 2013 《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香港：橄欖出版公司。
- 張瑞星、沈鍵主編 2015 《醫學心理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陳企瑞 2010 〈論敬虔主義者弗蘭克的信仰實踐〉，收入許志偉主編，《基督教思想評論》第1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130-143。
- (英)麥可·葛雷哥里奧(Michael Gregorio)著，宋偉航譯 2009 《謀殺理性批判》，臺北：遠流出版有限公司。
- 傅安球 2015 《實用心理異常診斷矯治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德)潘能柏格(Wolfhart Pannenberg)著，李秋零譯 2010 《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賴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香港：道風書社。
- 羅偉虹主編 2014 《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蘇 精 2005 《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蘇 精 2006 《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顧長聲 1985 《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顧衛民 1996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Brown, D. W. 1996. *Understanding Pietism*. Napanee, IN: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 Lutz, J. G. 2008.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 Schlyter, Herman. 1946.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C. W. K. Gleerup.

Karl Gützlaff's Early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Li Wu-zhe^{*}

Abstract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was a key figure i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and was well known for his emotional, strange and unreasonable character traits that resulted from a bitter childhood and frustrations he had gone through. In addition to the influences of pietism and romanticism, a clinical psychology observation also showed Gützlaff's personality retained core symptoms of a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which might be a vital clue in investigating Gützlaff and his choices within historical contexts. This methodology which introduces clinical psychology diagnostic criteria into historical research attempts to provide a valuable perspective into the investigations of historical figures.

Keywords: Karl Gützlaf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romanticism, pietism

* Li Wu-zhe,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Germany.